

教育展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教育季刊

中文版第12期

60

编者的话

学术交流

吉尔·安吉尔·埃斯科特：乌托邦教育规划与发展

文和南希·A. 马登：因轻微残疾影响学习的学生合并到普通班上课的问题

专题论坛：游戏在教育中的作用（II）：看法及趋向

马蒂娜·莫里拉斯·布斯凯：游戏的动因及学习的动因/托马斯·D. 约基：计算机进入幼儿园/利夫·维德勒：游戏在残疾人儿童教育中的作用/巴塞莱米·考默·科罗：非洲人关于游戏及其对教育的潜在作用的看法/本特·西林：怎样对待战争玩具：瑞典的经验/维耶拉·米舒尔佐瓦：玩具服务馆——一种新事物/伊万·伊维克：一项国际研究项目：传统的儿童游戏

趋向与现状

阿瑟·V. 彼得罗夫斯基：苏联的和平教育/米纳·斯韦米纳塞恩：亚洲的学前教育：问题和经验

评论

教育家简介：达弗林·特鲁斯坦雅克 / 书评/[附]中文版第9-12期总目录

乌托邦教育规划与发展

米格尔·安吉尔·埃斯科特

经济学和教育学一直以不同意识形态的名义，并为了制订各种各样规划的目的，使用“发展”这个概念。但是，人们所以把教育专门作为促进发展的手段，则主要是由于教育在培养满足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技术人力方面所起的作用。于是，教育就被认为是提供“人力资源”的部门（但我们对此不以为然）；教育变成了实际上专管快速培养专门人才的正规机构，把人看成生产要素，而人的社会作用、文化作用和公民作用却被看成是无关紧要的。

教育因此不再是人毕生的过程，而成了一个单纯凭书面成绩或比赛结果颁发证书和提高人的社会价值观和态度的系统。这样的教育系统所培养的学生，追求的是文凭或取得学位后的声望，而不是真正去追求知识，更谈不上学校毕业后的进一步学习。

此外，在经济领域的发展的理论现在变得一味追求如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达到经济方面的发展指标，而不容人分析一下这些变化究竟对人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这种理论把主要重点放在生产产品上，而不是放在产品的创造者和使用者的身上，以为生产定会间接地给社会带来好处。

这种发展方法反映在计划人员的理论和实践中，他们把他们认为可产生这种变化的一些措施应用到现实中，试图预测出可预见的变化。由此可见，规划背离了寻求一个理想世界的目的，而完全变成了一种预测预报技术。

乌托邦和现实的矛盾反映出理想与可能之间、一个不存在的世界与暂时建立的秩序之间以及今后规划与当前规划之间在认识论上的分裂。乌托邦和现实是人们为说明理想主义和务实主义是不可调和的生活方式时所常用的词，对此我们不敢苟同。此外，在当今金钱至上的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思想是认为乌托邦纯属毫无根据的推测和充满幻想

米格尔·安吉尔·埃斯科特（委内瑞拉），伊比利亚-美洲国家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秘书长（西班牙）。曾任美洲国家大学理事会经济和社会发展事务执行主任，委内瑞拉规划及预算部门办公室主任，第五届全国教育部门计划协调员。国立开放大学创办人兼副校长。委内瑞拉东方大学研究部主任。他是教育规划研究员和专家，在委内瑞拉和美国各大学执教多年。

的想象，不会有什么结果。

我们先不去对乌托邦思想和反乌托邦思想作哲学上的研讨——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在托马斯·莫尔爵士的著作发表后的十七世纪初就开始了，直到现在蒙克卢斯仍在发表分析研究论著（1981年）——但我们必须弄明白理想世界和学习进程之间的关系，明确乌托邦的实际含义究竟是什么。乌托邦一词的希腊文词源是 *ou*（无）和 *topos*（处所），换言之，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或世界。但是它未必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不可能存在。恰恰就是在托马斯·莫尔所著的《乌托邦》一书中，这一概念的意思是指一种理想的但在目前的秩序中不可能实现的计划或构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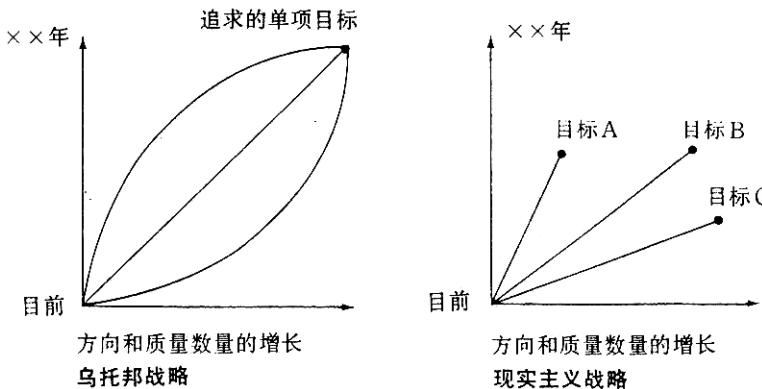
乌托邦这种学说是从泾渭分明的两个方面发展起来的。第一个方面是按照傅立叶的“法朗吉”理论，以空想为基础构成想象的现实或另一种空想；第二个方面则把现存的现实看成是实现以另一种未来可能实现的现实为基础的一个不同而更美好的世界的起点。我们认为第二种观点对未来社会规划的任何战略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反对当代规划学说中的“舍本逐末”论。

规划与自然增长

这种“舍本逐末”论在有关社会、经济和教育规划的论著中时有所见。在多数情况下，计划人员确定的目标与任何社会固有的不可逆转的自然增长的目标没有什么出入。按照罗伯特·L·海尔布伦纳的理论，人们维持某种现实是为了制订，说得更确切些是为了安排实现可预见的现实（往往是经济增长或发展的成果）的战略。这一发展概念的目的是要产生一个起始点，在这个起始点上，财富——其定义为生产力加资金——将超过国内消费。这就是人们为什么竭力提高国民生产总值的原因。通常，经济起飞靠提高农业生产和不断工业化来实现，同时出现一些管理不断发展的计划经济的新机构。结果是，面向发展的体制为了培养专门人才或开发人力资源，而促进了正规教育的发展，造就了一个专业人员阶层，推动了国家的现代化。

这种单纯的扩充式规划模式在今天的社会中，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表现得很典型，造成了规划工作中的舍本逐末现象，使规划工作变成一桩只是预报、有条不紊地组织和使人类理想的目标从属于可预见的经济发展的简单事情。规划往往只是明确目标而不是树立目标，是保持现实而不是改造现实，是迎合需要而不是满足对增加资源的期望。

我们称这类规划是“现实主义”规划，因为它用现实去配合现实，集中和调配资源，并以事先确定的可行的前景为基础。这就是现代规划。它缺乏创造性的想象力，不以改变社会进程为目的，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计划编制技术。决定是做出了，但是没有思想。做决定只是一件简单的事，即把存在的合乎逻辑的格局安到客体上，而这就是当代理性规划的典型。然而，为了弄清楚理性规划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是如何投射到未来的，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分析情况上。图表1说明了两种战略。



图表1. 两种战略

所谓的乌托邦规划的概念，是追求最完美的理想的思想，它能让推理、思考、想象乃至梦想发挥作用，并为人类革命的锁链提供了第一个链环。它是暴力的历史的和社会的继承。

图表1的右图代表现实主义规划模式，它有许多目标，但只有最大限度地利用可获得的资源才能达到。这一模式最常用的程序是预测和回归，而结果并不综合为一个单项目标。这说明发展的成果是多变的。通货膨胀和重新评价都可能产生同样的结果。这种体制要天天加以调整，缺乏长期眼光。这种规划战略的一大危险是，由于未来的变化动向是无法得知的，所以原以为很好的发展前景往往到头来使发展实际受挫。这方面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未能对保持生态平衡作出规划，只是到现在我们才认识到，因为造成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现在建议采用的战略见图表1中的左图。我们称这一模式为乌托邦规划，或叫集中于单一参数的备选式规划。这一模式只要求达到一个单项目标，所变动的只是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而这些途径可依照现有的资源作出计划。进展的速度一开始可能有慢有快或稳步渐

进，也可能遇到或多或少的障碍，但是决不会迷失方向而看不到理想的未来社会的轮廓。

乌托邦规划把理想与可能而不是把可能与现实结合起来。目标必须始终是理想的，尽管也许按今天的估计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未来总有一天是可能的。规划的方法用的是逆向序列式，从乌托邦目标开始，一直倒退到今天的现实。社会始终朝着乌托邦的方向前进，即使它一时达不到，也仍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这一思想战略与面向发展的概念大不相同，后者只选择短期目标，不把眼光放在我们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孩子的生活上。它无法描绘出未来的人，而把人变成自身创造物的奴隶。面向发展的模式由于没有长期目标而充满矛盾，无法维护对人类的生存有极大关系的生态平衡。

“现实主义”规划失败的最明显的证据是教育领域，这个领域问题成堆，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却不多。这里可举几个例子：

1. 这个模式认为经济（初级部门、第二部门和第三部门）的发展要求有技术熟练的人力，并认为正规教育系统可完全满足这种需要。社会要求提高教育质量，因为社会认为文化程度越高，职业前途也就越好，但是这种情况反而使教育质量更加降低，这是十分反常的。原因是这种教育体制所鼓励的不是教育而是获取证书和文凭。推动个人学习的动力是取得学历，而不是寻求知识，唯有寻求知识才能真正促使教育水准提高。人们追求的与其说是学习本身不如说是文凭。
2. “现实主义”模式很注重人力培训，以满足经济需要，但是在今天的社会中，失业的专门人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更不用说那些未受过专业训练而从事于某种职业的人员了。非资本主义国家的面向发展的模式也是这种情况。在那些国家中，职业培训不是与个人而是与一种使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结构长期维持下去的生产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其目的是提高生产而不是调节这个生产制度中所固有的社会关系。这两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唯一差别在于效率和官僚主义。资本主义制度吸收人力资本做得不好，但在提供职业方面具有更大的选择性，而社会主义制度则雇用过剩的专门人才，造成官僚主义。
3. “现实主义”规划模式，不管是一个机构的还是一个国家的，都是以现有需要为基础，编制一项全面战略来满足这种需要。这叫做短期或中期计划。但是鉴于正规教育体制起码要花十八年时间才能完成对一名学生的培养工作，结果，在那个阶段末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只是为了去满足已经过时了二十年的需要和目标。例如，一批计划人员在一起草拟一个师资培训计划，

他们总是以今天培养一名教师的一些数据为根据，把目前的情况作为他们草拟计划的基础。谁也不敢说新的课程设置应为以后五年培养教师。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知识如潮涌、人口流动性极大以及（特别是在最贫穷的国家中）人口增长率很高的世界上，情况就尤其是如此。佩尼亚尔瓦（1975年）将教育比作栽种和采集水果。它不仅是个时间问题，而且也是个种子的品种、土壤、管理和采集以前是否成熟的问题。栽种和成熟阶段的情况好坏取决于我们打算作出多少努力。

面向发展的模式所引起的上述三个问题又与一个涉及范围更广的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世界不知向何处去。人一天一天对自己的命运一点点地失去控制，或日复一日地只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对命运不知不觉地失去控制。我们唯一的希望所在是乌托邦规划，而且要一心一意下决心去争取乌托邦。

乌托邦的规划是一个长期的社会特征，因为当乌托邦实现时，更确切地说是当它快要实现时，即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乌托邦已变成现实，而新的乌托邦已形成时，它就变了。

短期、中期和长期计划是根据为保证应急计划或专门计划能符合所谋求的变革的总方向而编制的总计划加以拟定的。乌托邦规划是根据一种思想分析来制订的，这种思想分析确立一套发展理论，以人为中心并反映人的自我改善能力的限度。

因此顾名思义，“发展”是协调而和谐的发展。它向人提供实现民主所必不可少的基本生活资料，从而有可能促进人的创造力。在这一思想流派看来，在谋求对现有社会和教育结构进行彻底改革的民主制度中，人成为一切规划的中心。根据乌托邦的观点看，假定民主的基础是可以完善的，那么它是不可动摇的，只是教育必须以尽可能的最高理想来进行塑造思想的工作：要让人们对他们自己及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树立一种批判意识和责任感。这样，他们才能一起努力建设他们自己的未来。无须说，这就意味着这样一个教育体制，其基本政策或原则应能弥合总计划与执行计划之间、乌托邦与现实之间、思想与实践之间的差距。

2000年的学生

由于技术发明很快，时间标度缩短了。十五世纪时，从一个洲到另一个洲，航行三个月被认为是很短的。今天，八个小时的飞行即可走同样的路程，却似乎觉得是很长的旅行。时间是一种依人的类型以

及其生活的节奏而定的与人有关的可变因素。据一些人类学研究表明，在原始社会，人的估计寿命只有当代西方人的一半，时间过得较慢，只及现代城市居民生活速度的一半。我们所以指出这一点，是因为，尽管看来离二十一世纪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实际上连十五年也不到，甚至还不够现有教育体制培养一个能从事某种职业的人所需的时间。

到2000年，单拿接受正规教育来说，学习的要求不仅更加多种多样，而且数量也更大。表1所示为二十一世纪初的学生人数。最近五十年内世界人口的增长，加上估计寿命的延长，使数字变得空前庞大。世界总人口达到十亿这个数差不多花了五百万年，直到公元1800年才达到。只过了130年，到1930年，人口增长到二十亿。到1960年，总人口达到三十亿。到1975年已超过四十亿。到2000年地球上将有六十亿人。到那一年，世界80%的人口将居住在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学生差不多有五十亿。

拉丁美洲的学生在仅仅二十年内将增加一倍，达到约60,800万。学生人数激增这个问题必须马上加以解决。因为采用面向发展的模式，只能勉强满足目前学生的半数，而在不到二十年内要求入学的数目将增加一倍，而教育系统又无法解决，那时又该怎么办呢？表2和表3说明全世界在校学生的趋势。最工业化的国家即最不穷困的国家，2000年的在校学生人数将比1981年少，而其余国家，数目将增加80%。拉丁美洲相对增加人数为84%，实际在校学生人数增加132%。如果保健计划搞得更好一些，婴儿死亡率下降，这些数字还会更大。如果我们再考虑到世界人口的这种激增使学生和教师比例完全改变，那么形势会显得越加严重。根据今天师资培训的增长速度，要现有系统容纳六亿学生（其中60%以上在25岁以下）是不可能的。据估计，到本世纪末，没有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有能力为全部小学年龄组的孩子提供初等教育，因此文盲率将高于1980年。尽管人们作出努力想扭转这种趋势，但是世界文盲数将从82,000万增加到2000年的十亿，这就是说，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将不能接受读和写这样的基础教育。

二十一世纪的学生

说最近二十五年中全世界在改进和推广学校教育方面没有什么进展是不对的。但是从数量和质量结果来看，在校学生人数甚至赶不上实际需要，更不用说达到乌托邦的需要了。

卡诺埃（1974）论证说，认知能力与社会阶级密切有关，学习成绩是由于社会阶级和学生所接受的教育量而不是由于实际的认知能力。

表1. 1950年到二十一世纪的学生统计数（单位：百万）

地理区域	1950		1975		2000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非洲	219	8.7	406	10.1	828	13.4
美洲	330	13.1	559	13.9	897	14.5
拉丁美洲	164	6.5	323	8.0	608	9.8
北美 洲	166	6.6	236	5.9	289	4.7
亚洲	1 379	54.9	2 318	57.4	3 612	58.2
东亚	673	26.8	1 063	26.3	1 406	22.7
南亚	706	28.1	1 255	31.1	2 206	35.5
欧洲	572	22.8	728	18.1	832	13.4
大洋洲	13	0.5	22	0.5	30	0.5
世界总计	2 513	100.0	4 033	100.0	6 199	100.0
最发达国家	832	33.1	1 093	27.1	1 272	20.5
最不发达国家	1 681	66.9	2 940	72.9	4 927	79.5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 1978 年联合国关于需要量研究报告的材料计算。

表2. 学龄人口趋向（单位：百万）

社会经济地区	1960	1980	2000
世界总计（6 - 23岁）	1 069.5	1 660.4	2 152.2
6 - 11岁	424.4	599.8	773.8
12 - 17岁	340.3	556.1	724.4
18 - 23岁	304.8	504.5	654.0
发达国家（6 - 23岁）	286.5	331.2	321.9
6 - 11岁	107.8	104.8	109.4
12 - 17岁	91.1	110.8	108.9
18 - 23岁	87.6	115.6	103.6
发展中国家（6 - 23岁）	783.0	1 329.2	1 830.3
6 - 11岁	316.6	495.0	664.4
12 - 17岁	249.2	445.3	615.5
18 - 23岁	217.2	388.9	550.4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 1978 年联合国关于需要量研究报告的材料计算。

换句话说，求知的要求来自社会等级而不是来自知识本身。对教育的组织安排到了这种地步，那就是要维持面向发展的方针的等级结构，而教学的首要目的是要训练学生去争夺工业金字塔之巅的为数有限的职位，而不是共同努力去改善他们共同的条件。使这种情况加重的一个因素是，所设置的班级学科既不符合就学的社会目的，也不符合理工科的划分。举例来说，探索外层空间物理学的进步被看成是“工艺技术上”的进步，而对保健中心规划和管理方面的进步则不这样看。鲍尔

表3. 二十世纪最后四分之一（1975—2000）拉丁美洲人口和在校学生的估计增长数（以百分数表示）

学龄组	人口相对增长数	在校学生相对增长数
	1975—2000	1975—2000
总计（6—23岁）	83.6	132.3
6—11岁	76.3	111.4
12—17岁	84.4	133.0
18—23岁	93.0	246.3

资料来源：教科文组织，教育和预测数，1979。

斯和金蒂斯（1973）也认为，就学生今后担负的社会任务而言，他们所学习的最有用的技能是与社会阶级有关的行为能力或非认知能力，这种能力是由不同类型的学校，甚至在同一学校的学生中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培养出来的。

必须指出，学校招生的战略，从数量和教材内容方面看都是不够的。（a）它只能容纳一部分学龄青年；（b）学生的幸存率，尤其是在拉丁美洲的幸存率太低。据估计，进正规教育系统的每1000名学生中，只有五名能完成全部教育；（c）所授学科既不反映新的先进知识，也不反映作为人类职责的对社会改革的态度。现今，教育只是现有社会结构长期延续和再生产的工具，而不是改善个人和集体的价值体制，使人掌握驾驭环境及决定其前途的本领的工具。总之，对于教育，面向发展的体制下达的唯一任务是培养生产组织的人才，而不是使人完善成为一个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全面的统一体。人类，发展的真正中心，已被发展的创造物之一，即商品生产所取代了。

今天教育面临的这第二个问题的一个方面就是它无法适应科技的进步。等到教育适应知识和学习的新形式时，教育机构及其教学体制就会大大落后了。尽管教育体制能影响某些社会部门，但是它也受社会的制约，因此它必须适应社会的众多而日益复杂的变化。不断改变的思想方法的要求、科学发现、新技术、学校人口稳定的更替以及采取电视广播形式的平行教育的出现，都仅仅是正规教育难于吸收消化的一些因素。教育系统本身就不太愿意接受新教学方法和新教具。在人造卫星的时代，学校依然在用黑板和粉笔进行教学，这甚至不是现实主义规划，而是甘心因循守旧。

远距离教育是技术方面的一个典型，它能填补科学发现及其普及之间的差距。仅以师生间相互作用为基础的正规教育系统是不可能跟上科技日新月异的进步速度的。远距离教育提供了一种使教育适应当

前和未来技术的途径。几乎在所有国家，远距离教育现在都得到迅速推广，这使人们对正统教育的新格局抱有希望。我们赞成这种教育，尽管我们对它的发展方式有所批评。

远距离教育必须谨慎从事，因为不能担保革新的办法定能产生新的结果。即使是革命的办法也会产生极端的保守主义者，从而会加强面向发展的意识。

远距离教育对教育人们进入二十一世纪可能有很可贵的帮助，但是它也可能变成一个扩大我们与乌托邦之间距离的体系。本文作者不时批评远距离教育技术，因为它为了培养专门人才提供知识（而且其效率几乎总是不如传统的方法）。现在世界真正需要的是能了解当代世界推动力并能适应和改造这种推动力的受过教育的人。远距离教育培养出来的专门人才将很快看到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变得陈旧了，而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在必要时应能发展或创造出新的能力。

因此远距离教育必须突出教育的启蒙方面和创造方面，同时不排除讲授。这只是一个如何处理两个可变因素的问题。多数远距离教育体系总是设法统一教学内容和方法，忽视，乃至完全取消学生在教育过程中可以起的作用。学生单纯变成一个多少是系统化知识的接受者。从纵向关系看，学生与他们所完全依赖的教材毫无关系可言。综合学习要求让人以生来就有的权利参与教育过程，因为人具有重新改造和重新创造的能力。根据弗莱雷（1973）的看法，对参与来说极为重要的对话，不在于学生去追溯科学进步的各个历史阶段，而在于对涉及当前现实和对现实有影响的知识提出挑战，并试图理解、解释和改造现实。就象对知识的历史和未来方面、它在时间上的位置及其应用等问题应加以讨论那样，对科学发现的意义也应加以讨论。弗莱雷认为，物理学学得最好的学生不是把公式背得滚瓜烂熟，而是能理解公式的基本原理。哲学学得最好的学生不是能解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罗素或黑格尔的著作，而是能以批判的观点对待所有这些著作并敢于思考。

参与，即双向教育，是过去实行个别教学的特征。这方面没有什么新东西：柏拉图在他的《对话》中已证明了参与的价值。今天，单单从人数上说，就意味着对话仍处在意向的阶段。这对远距离教育是个挑战：将大众教育转变成双向的启蒙教育，有了启蒙教育才有可能谈得上乌托邦和改变历史进程。

如果我们认识到占去人生好多年的正规教育仍不能保证维持或改善人类的条件——一种意味着使人类不断得到完善的理想——，那么对教育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的要求就更高了。采用使教育持续二十四年乃至二十六年的“现实主义”计划，是不可能的。现在需要的倒是

一个连续的教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教育界”，换言之，整个社会都采取一种毕生学习的态度，并能适应未来，而无须不断破坏人类生存及其文化所依赖的结构和价值观。

与目前的只有有限一段时间的教育相比，连续教育，不论是正规的或非正规的，都是乌托邦规划的目标之一。学校不单纯传授知识，而要承担要求高得多的任务：教会人们如何学习，甚至教会离开正规学校后如何继续学习；颁发证书或文凭只是承认完成了一个教育阶段的学业；以及改变社会授与合格证书的结构。

假如在二十一世纪世界上不发生国际大决战，那么那时的学习将要求教育系统在更大的范围内参与自己未来的活动。由于技术的发展，获得知识的方法将日趋简单、容易和准确。工作日要短得多，可以有更多时间进行创造性的业余活动，使教育的等级观念越来越少，并使人在一生中可以更加连续不断地接受教育。教育系统将重新发现其真正的作用，那就是为个人服务，帮助培养个人掌握认知技能和思考能力，形成对现实的批判意识以及与自己周围的人合作。由于知识可以通过其他制度化的方法或非正式的方法获得，知识就不再以教育系统为第一位。知识和培训将并驾齐驱，互不偏废。

我们不再生活在一个专家的世界而是一个普通人的世界。他们把专门知识与一般知识融于一身，而且能把有机教育的目的看成是要在不妨碍增长的情况下建立平衡，又在不影响平衡的情况下促进增长。刘易斯·芒福特写道：

“我们建立了一个与自动化紧密相联的产业秩序，在这种秩序中，精神衰弱，不论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对容易驾驭的工厂生产来说都是必要的。在这种秩序中，极端乏味的生活赠送给人们的最后礼物就是普遍性的神经机能症。我们的生活为一帮专家所支配，他们对他们的业务范围以外的情况了解极少，因而也不能充分了解他们业务范围以内的事情。他们是失去平衡的人，不是在疯狂中制定方法，而是方法本身就是疯狂的。我们的生活象医术一样，因为抛弃了解认真诊断和治疗个人和集体病症的开业医生而受到损害。究竟怎样真正算是一个人，为了造就这种人我们的观点须作什么样的改变，现在不是已到了我们扪心自问的时候了吗？”

乌托邦教育计划的原则

原则或政策是沟通现实与乌托邦的桥梁。要制定这些政策，就需要订立能确定最符合未来要追求的那些价值观的新标准。这件工作要

求规划目标须改变价值观体系以使它与现今的情况与对未来的展望紧密联系起来。在这类规范的规划中，各种定义要从价值观中得出，并要提出各种要求。一项教育政策必须反映一个国家的政治选择、它的传统、价值观以及其未来的想法。

一般说来，从价值观中产生帮助具体说明政策主要重点的原则。政策又必须得到战略的支持，而战略则须提供实现总计划目标的各种方法，这些目标仅指最合理地利用了现有资源之后所能实现的那些目标。战略通过这种形式从现实走向乌托邦，从可能走向理想，它必须有规定了具体优先次序、活动、进度表和资源等的具体执行方案。这样，计划就有了通盘的连贯性，这种连贯性是促进沿着乌托邦的方向不断实现最初制定的目标的各种方案和活动所必须的。乌托邦规划不能仅限于由某个行政部门或某个官方机构来管理，而必须让大家参与，因为主张的产生、成败的出现和计划的执行都出自于社会。

我们将这种思想应用于发展和变化中的民主社会时，可以排出各种教育原则或政策作为一个国家教育工作计划和活动的主要方针。简而言之，我们可举出三项基本政策：

促进民主的教育

这一政策建立在民主的社会类型的基础上，与一切极权主义、个人崇拜或取消共同参与相对立。社会的所有成员应该：(a)被教育成为民主社会的民主公民；(b)切实有权接受最低限度的基础教育，使他们无论作为个人或作为今天的社会和未来飞速变化的社会的积极活跃成员，都能依靠自身力量达到目标；(c)在他们完成义务教育或基础教育之后，依据他们的兴趣、爱好和技能情况并按照“学习社会”的理想，享受继续学习的真正机会；(d)享受补偿津贴以补偿一切可能产生的社会、文化或经济上的损失；(e)得到真正的机会，以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和积极参与基层社会组织的活动。

这一条的目的不仅是通过机会均等使教育民主化，而且使社会的每个成员都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民主主义者，他们自己既能享受自由，又能本着合作而不是竞争的精神尊重别人的自由。

促进创新的教育

教育系统需要新的推动力，推动各种变革进程。这些变革必定会

影响到有助于充分发挥参与人员和管理部门创新能力的该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因此教育系统必须与不断实现社会生气勃勃的更新改造相适应。为此，必须采取一种三管齐下的方针：

- 把英才教育改造成为大众教育，这意味着要有新的方法、新的结构、新的课程、新的态度和新的价值观。
- 使教育过程能不断适应未来的社会情况，适应理论、方法和技术领域的进步和发现。
- 所提供的教育类型应是以学生为中心，符合学生的环境、需要和愿望，也符合社会的环境、需要和愿望，这将激励学生的创造能力并鼓励他们创造和发明科学技术。

这就必然意味着推动个人去创新，使他们成为能预见未来，预见新的思想方法所产生的新的需要的研究人生的人。

促进自立发展的教育

这项发展政策的基本目的是确保生活幸福和提高社会生活水准。根据这一政策，应使教育系统适合于为人类及其环境服务。这样就可利用社会的创造潜力，使人类能够有效地掌握自身的命运。因此，这一政策的基本原则就是：教育不仅要以满足需求（面向发展的立场）为目的，而且还要使需求适应于合乎人类理想及其文化层次的发展目标。教育将从下列方面对谋求自立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 通过科学、技术和行政机构的创立和它们的工作，开发一个国家的科技潜力，使这个国家能充分利用其资源和生产，教育其人民，并指明经济增长的方向，使之具有深远的意义。
- 有计划地培训国家优先领域的人力。这种领域不仅包括生产部门，还包括有关价值体系和有关作出社会、政治和行政决定及其执行的部门。
- 提高教育系统确定和改变价值观的能力。教育系统除了支助生产和管理等部门外，还要支助卫生、业余活动、营养和住房部门。
- 促进和发展体现民族特性的文化的真正的民意表达形式并使之多样化。
- 开放国家教育面向国际事务。虽然在各国文化和各民族之间必然会有相互影响，但是社会将因此提高其生产能力，而又不会失去其民族特性。

这三项政策的一致点是，既面向理想的社会目标，又使政策具体化，成为变革的战略。这三项政策都反映了人类作为个人和作为集体

中的一员要求发展的夙愿。但是，如果我们不考虑到会威胁甚至会堵塞通向乌托邦的前进道路的各种可变因素，那就仍难于制定国家发展计划。尽管各个社会以其成员的生活方式及其领导人所采取的政策为基础，各自有其自身的动力，但是在国际或“超国家”范围仍存在一些与国际社会各成员的特性有关的无计划的目标。虽然在发展计划中对有计划的目标可重新修改调整，但“超国家”的目标反映国际范围人口的错综复杂情况，同时对某个特定社会的前途又起决定作用。因此，一个国家的过去和未来不仅受这个国家本身而且还受与它必然有相互影响的其它国家的制约。

这一历史范畴是国家和国际文化发展的产物，各种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即使不一定反映危机的情况也反映了变革。正如奥尔特加·加塞特在驳斥斯彭格勒的“西方走下坡路”的理论时指出，变革产生了一场危机，它就消灭一种价值体系，而代之以另一种价值体系。变革是演变所遵循的法则，危机意味着变革的失败。危机之所以发生是由于社会对变革没有准备。这正是那些计划搞乌托邦式教育的人的行动目标：让人们对持续的变革有准备，即使为此必须忍受短暂的危机。变革总是渗透进文化的各个部分：某一部分的任何一次重大变革总是立即影响到整体。一个社会应能缩短其边界而不损害其主权，应能长期保持被认为对其文化至关重要的价值观，同时继续对未来作周密思考，选择它要进行的那种变革。

这并不意味着要吸收外来的不良的价值观去代替很好的传统价值观。但事实上眼下就发生着这样的事。不少国家由于至少存在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反映民族特性、以传统价值观为中心的文化以及从外国进口的模仿外国文化的价值观的文化，情况令人十分不安。如果一个社会贬低民族文化，而突出消费社会的价值观，那就会产生激烈的冲突。充满活力的乌托邦的目标是保护人的基本价值观（包括崇高的社会民主理想）并促进增强民族文化的人类普遍的价值观。一切以乌托邦目标为基础的解决办法，当然必须从民族的和国际的角度来处理国家问题。

因此，一个社会对它周围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情况应了如指掌，避免不惜以一项近期的发展为指导原则的那种自我中心的政策。促进乌托邦发展的教育意味着不仅要教育好个人，而且要向他们灌输集体意识，从而使他们有一种超越本国国界和本国文化的使命感，以全体人类作为所有个人反思的目标。

如果对教育，因而也就是对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不进行研究，那么对未来的任何讨论都不能算是完整的。在现实主义规划中，这是

不可想象的，因为现实主义规划总是受帝国主义性质的社会的约束，这种社会强迫其成员接受由无所不在的政治或经济统治集团控制和规定的立场。达官贵人的存在乃是为了长期维持自己的地位：说他们的目的竟是自上而下地改组社会，这真是不可思议的。

由于任何一个人与另一个人都是不相等的，因此这个乌托邦规划的方针所谋求的不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而是一个富裕而多姿多彩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任何一个人的职业都不能使他具有支配另一个人生活的权力，做工作是为大家谋利益，这与为了某一工作而培训某个人的面向发展的规划正好相反。

我们的乌托邦把理想的目标置于被探索的或可预见的未来与尚未被探索的未来之间。这样，我们所建议的规划模式是能动的而不是静止的，因为我们越接近目标越感到需要新的指导方针。我们的乌托邦设想意味着要超越现有社会结构的可能性，同时又把过去和现在揉合在一起，既要利用那些赞成新社会模式的人，又要利用那些希望现今社会能维持下去的人的力量。这样一来，乌托邦战略所遵循的道路有时可能导致理想的目的，有时则可能倒退，甚至成为反动。乌托邦规划通过分析互相对立的战略的冲突可以预见到这类波动。这种分析有助于使这些战略走上一条较长期的道路，因为所有战略尽管会有一时的偏差，但是都集中于一个参数，即思想上明确一个前后一致的目标或政策结构，这种结构的整体总是大于局部的总和。

因此，乌托邦规划的活力在于能确定各种备选的道路，在于能预测起伏波动，以便较顺利地走向理想的目标。乌托邦战略还要探索实施政策和达到理想目标的相互冲突的方法和不同途径。因此它可以选一条临时道路，以便同时采用相互冲突的战略。总之，乌托邦规划要求进行辩证分析，这种分析应与历史进程、推动历史前进的社会力量以及通过发展想达到的变革密切协调起来。

马图斯（1972）指出，由国家制定的现实主义规划不是路线错误就是缺乏明确的方向。没完没了的调整措施或政客们的煽动手法总是妨碍对发展作长远的全面评价，增加人民的依赖性并挫伤人民追求更美好生活的积极性。

我们这个贫穷的世界意识到生存的机会是有限的。人类自作自受的悲观主义发展到制造毁灭自身的武器，也是那种摧残我们自己的病症的可怕的产物。医治这种病症的一剂良药就是教育系统。要使人类免除这种有毁灭之险的流行病，不论作为权利还是作为义务，都是教育系统所义不容辞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能还不具备促进变革的一切手段，乌托邦规划所提出的问题也还没有找到全部答案。但是有一点我们是深信不疑

的，那就是我们必须立即开始认真工作。我们须有“伸出手去摘星星”的气概来制定计划，着眼于对新世纪充满希望的图景。

(严修莹译)